



**HAL**  
open science

## 西法东渐中的知识自主

Mingzhe Zhu

► **To cite this version:**

Mingzhe Zhu. 西法东渐中的知识自主: 以里昂中法大学法学博士培养为例. *Revue de l'Université Jiaotong de Shanghai(Philosophie et Science Sociale)* (《上海交通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 29 (05), pp.139-155. <10.13806/j.cnki.issn1008-7095.2021.05.014>. <hal-03856910>

**HAL Id: hal-03856910**

**<https://hal.science/hal-03856910>**

Submitted on 10 Jan 2023

HAL is a multi-disciplinary open access archive for the deposit and dissemination of scientific research documents, whether they are published or not. The documents may come from teaching and research institutions in France or abroad, or from public or private research centers.

L'archive ouverte pluridisciplinaire HAL, est destinée au dépôt et à la diffusion de documents scientifiques de niveau recherche, publiés ou non, émanant des établissements d'enseignement et de recherche français ou étrangers, des laboratoires publics ou privés.

# 西法东渐中的知识自主： 以里昂中法大学法学博士培养为例

朱明哲

(中国政法大学比较法学研究院,北京 100088)

**摘要:** 学界常视近代西方法学知识传入为被动接受欧美知识的过程,忽略了我国知识精英的自主性。然而,里昂中法大学所见之博士论文写作过程显示,近代留法法学博士不仅对自己所欲学的知识以及学到这些知识的最佳途径有明确认知,而且为了实现心目中的最佳学业选择,不断与指导教师和中法大学管理层沟通乃至争执。他们的论文中普遍表达了对近代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和政府解决社会问题之方法的关注。这种选择既受到里昂法学院学术氛围的影响,又是当时留法学生共性的体现。他们延续了里昂倾向于社会科学研究和同情社会主义的特点。与此同时,他们又像其他留学生一样,时刻关注祖国时局的发展,对当时的中央集权的政府抱乐观态度。

**关键词:** 里昂中法大学;法学教育;中法交流;自主性

**DOI:** 10.13806/j.cnki.issn1008-7095.2021.05.014

## 导 论

里昂中法大学(1921—1951,下简称“中法大学”)的建立是“争回里大”运动的导火索之一,但其在中国近代史上的意义远不止于此。一方面,该校开办的30年正是20世纪法学变迁的关键时刻;另一方面,我国也在这段时间里完成了法制和法学的现代化。<sup>①</sup> 所以,这一机构对于理解我国法制近代化尤其重要。中法大学第一次在世界范围内形成的法律共同体,提供了一个超越地理限制的舞台,让追求近代化的中国精英与同样寻求变革的法国法学家相遇在里昂这个独特的地点。中法大学为中国培养了76名法学专业学生,其中包括25名法学博士。<sup>②</sup> 通过解读他们的档案,我们可以辨认出这些法学博士的身份、理论关怀、与里昂法学院和法国法学的关系,从而进一步揭示中国知识精英们的本土意识。

诚然,中国法制近代化以“西法东渐”为重要特征,而且表现出高度的西方中心主义倾向,<sup>③</sup> 但研究此过程仍然不该忽略那些亲身参与者的自主性。<sup>④</sup> 此前,大部分研究主要把法制近代化表述为外国法律在我国的移植或我国学界对外国学说的继受。晚近研究则同时关注两个方面:

**作者简介:** 朱明哲,中国政法大学比较法学研究院副教授。

**基金项目:** 2021年中国政法大学科研创新项目“《民法典》生态规范司法适用研究”(21ZFG82004);2021年中国政法大学青年教师学术创新团队支持计划(21CXTD02)。

① 黄阿明.新法制与旧礼法[J].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6):96-108.

② Liste des étudiants de l'Institut franco-chinois de Lyon, Fonds chinois de la bibliothèque municipale de Lyon. 葛夫平.中法教育合作事业研究(1912—1949)[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76.

③ 朱明哲.中国近代法制变革与欧洲中心主义法律观:以宝道为切入点[J].比较法研究,2018(1):155-170.

④ 朱晶.论民国时期科学理想与社会诉求的建构[J].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3):93-103.

中国被迫接受西方现代法律;西方通过对中国的叙事而构建自身。<sup>⑤</sup>在此基础上仍有必要继续追问参与法学知识传播的中国青年精英如何在不同的现代化道路中进行选择。在他们学习国外的理论、观察他乡的实践时,恰恰是对本国命运的关心影响了他们的观察、评价、阐释。<sup>⑥</sup>本文希望延续以上思路,通过检视中法大学法学博士论文的撰写过程和实质内容,说明中国青年精英在法学知识移植方面的自主性。

跨国史为理解这些材料提供了一种视角。<sup>⑦</sup>传统上理解中外法文化交流主要有两种范式:继受移植范式和殖民批判范式。继受移植范式视法律交流为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手段。<sup>⑧</sup>这种范式强调不同法学知识的等级秩序,文明程度较低的国家只能向更文明的国家学习,断然没有文明“互鉴”的可能。<sup>⑨</sup>出于对继受移植范式的不满,殖民批判范式试图揭示隐藏在文明等级观念背后的“权力—知识—话语”三者之间的重叠关系,最近在学界引发热议的“法律东方主义”就是其中的代表。<sup>⑩</sup>两种主流范式都假设了主体—客体的二元对立,既忽视了双方的互动,又忽略了每一个行动者与其所处的社会条件之间的互动。为此,本文采取一种“跨国史”的新视角,消解国界和世界经济政治秩序所固化的中心与边缘关系,把重点放在各区域之间的沟通本身。<sup>⑪</sup>它把每一个时期法学的形成看作不同区域的法学家群体互动的结果,并因而关心不同行动者根据自身利益采取的策略性行动。<sup>⑫</sup>为了重构法学交流中发生的“事件”,研究者就必须理解行动者的观念、可以选择的策略,以及他们的社会关系。

本文主要运用中法大学档案与该校法科学学生的博士论文,拟厘清他们在里昂所见、所学、所感之具体内容。把中法大学的法学教育置于中法两国变革背景中,有助于从跨国法律史的角度揭示中法法学交流复杂而微妙的内涵,从而进一步呈现当代法学知识之国际化特征。本文将先展示中法大学法学博士论文的作者、写作时间、导师人选。然后,利用学生档案、特别是其中通信往来,还原他们为了争取主导地位与法方管理人员的谈判过程,从而突出留学生在知识生产过程中的自主性。他们的论文则体现了两个交织着的主题: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 and 国内社会问题。可见他们对知识生产的内容也有自觉的意识。最后,留学生博士论文创作过程将在里昂法学院的特性和中国留学生的共性两个背景中得到理解。

⑤ 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包括了赖骏楠.国际法与晚清中国:文本、事件与政治[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李秀清.中法西译:《中国丛报》与十九世纪西方人的中国法律观[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5.译著则有,络德睦.法律东方主义:中国、美国与现代法[M].魏磊杰,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6.

⑥ 章永乐.维也纳体系与君宪信念的持久性:以康有为为例[J].清华法学,2017,11(3):62-78;章永乐.发现“二十世纪之宪法”:以20世纪20年代前期为中心的考察[J].清华法学,2021,15(3):92-113.

⑦ Iriye A. Global and Transnational History: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M].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3: 9-10.

⑧ 王泽鉴,朱虎,汪洋,等.德国民法的继受与台湾民法的发展[J].比较法研究,2006(6):3.

⑨ Frankenberg G. Critical Comparisons: Re-thinking Comparative Law [J]. Harvard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 1985, 26(2): 411-456.

⑩ Ruskola T. Legal Orientalism: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and Modern Law [M].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352; Coendet T. Critical Legal Orientalism: Rethinking the Comparative Discourse on Chinese Law [J].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Law, 2019, 67(4): 775-824; Clarke D. Anti Anti-Orientalism, or Is Chinese Law Different? [J].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Law, 2020, 68(1): 1-40.

⑪ 李富鹏.全球法律史的中国写作:“复规范性”与法律史学的空间感[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34(6):14-26.

⑫ Bourdieu P. La force du droit: Eléments pour une sociologie du champ juridique [J]. Actes de la Recherche en Sciences Sociales, 1986, 64(1): 3-19.

## 一、里昂法学院里的中国青年

中法大学本身只负责学生的饮食起居,而不组织教学。中国学生考试合格后进入里昂大学的各个学院学习。所以,想学习法律的中法大学学生需要在里昂法学院注册。在中法大学取得法学博士学位的25名学生中,除了入中法大学前便在巴黎大学取得了博士学位的张祖庚,历经波折最终转学去巴黎的夏晋熊和陈绍源,以及转学去格勒诺布尔的钱翔孙4人,有21人在里昂完成了学业。从中法大学第一名法学博士、日后成为汪伪政权外交次长的吴凯声于1921年10月正式注册,<sup>⑬</sup>到魏登临于1944年5月31日博士答辩通过,这21人于23年间在里昂法学院的怀抱中成长为独立的法学家。据考证,1962年以前在法国取得法学博士学位的中国学生人数在230人左右。<sup>⑭</sup>其中获益于中法大学者竟超过了十分之一,可见中法大学法学博士生在选题和写作方面的经验应当较为具有代表性,能够折射出其他留法中国学生的共同意识。与此同时,中法大学为学生提供的校舍和生活补助让他们相较其他留法学生而言经济负担更小。中法大学的秘书处作为学生管理机构负责学生的课程组织、学业安排、奖学金发放,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他们的选择。所以,他们为了坚持自己的立场,中法大学的学生必须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以期获得校方首肯。其结果是他们留下了更多的信件可供研究,而反过来也可以佐证其他留学生能更容易地坚持知识拣选和阐释方面的自主性。

中法大学取得博士学位的程序和其他法学院一样。根据1895年4月30日的法律,法学博士学位(Doctorat en droit)包括法律科学博士(Doctoratès sciences juridiques)和政治经济学博士(Doctorat ès économies politiques)。希望取得博士学位的学生必须先通过至少两门科目的口试,才能开始博士论文写作。与现在动辄4年起步的论文写作周期不同,当时的博士论文写作时间一般在1到3年之间。在此期间,学生没有必修课的要求。完成论文后,博士生需要先取得院长授权,然后在出版社打印一定数量的论文,并交到答辩组成员手中。答辩组主席一般是论文的指导教师。即便在每年申请人数少于十人的外省法学院,每年仍然都有无法通过答辩的候选人。

不同于档案大部分已经散佚的其他法学院,中法大学的档案较为完整地保存在里昂市立图书馆。它们打开了一扇窗口,让今人了解这些中国青年的考试、上课、选题和受指导的情况。在翟俊千、曾锦春和黎国材的档案中,留下了他们在进入博士论文写作阶段前必须通过的口试的成绩单。其中,翟俊千的档案最为全面,在1925年7月15日的口试中,他选择了国际公法(Droit international public)、比较宪法(Droit constitutionnel comparé)、经济学说史(Histoire des doctrines économiques)作为口试科目。<sup>⑮</sup>他的口试委员会(不同于最后的答辩委员会)成员分别是国际公法教授皮克(Paul Pic)、比较法和民法教授朗贝尔(Édouard Lambert)和政治经济学家戈纳尔(René Gonnard)。这名细心的学生还在档案中留下了他从1923年到1924年所学课程的记录。从中我们看到他在法学院分别上了戈纳尔的经济学说史和政治经济学、朗贝尔的比较法、皮克的国际公法,还有布维耶(Émile Bouvier)的比较宪法和财政学(Science financière)。除此之外,他学习了文学院的社会学和道德哲学课程。<sup>⑯</sup>科目和教授人选与留学生们的知识获取联系密

<sup>⑬</sup> Archives l'Institut Franco-chinois de Lyon, Dossiers Étudiant Numéro 22 (Wu Kaisheng), Sous-dossier # 1[A]. Dossier contenant 86 pièces numérotées de 1 à 86 [1921-1926], No. 1.

<sup>⑭</sup> 王伟.中国近代留洋法学博士考(1905—1950)[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180-278.

<sup>⑮</sup> Archives l'Institut Franco-chinois de Lyon, Dossiers Étudiant Numéro 102 (Zhai Junqian), Sous-dossier # 1[A]. Dossier contenant 61 pièces numérotées de 1 à 61, No. 18.

<sup>⑯</sup> Archives l'Institut Franco-chinois de Lyon, Dossiers Étudiant Numéro 102 (Zhai Junqian), Sous-dossier # 1[A]. Dossier contenant 61 pièces numérotées de 1 à 61, No. 14.

切,后文将详细讨论。翟俊千在三门口试科目(满分是20分,只要取得10分就及格)分别取得了15分、15分和12分的成绩。曾锦春于1926年7月15日通过口试时的成绩分别是:国际法14分、行政法15分、政治经济学12分。<sup>⑰</sup> 同一日,黎国材也口试通过,其科目分别是国际公法、比较宪法和经济学说史,三科总分43分。可见这几名中国学生的口试科目选择也比较集中在国际法、公法和经济学这几门课程。当时法国学生最热衷的民法却乏人问津。他们的成绩不分伯仲,而且正如大部分人学位论文只能拿到“良”(bien)或“中”(assez bien)的评语一样,不算很糟糕,但说不上多好。无论如何,他们已经因此通过口试,可以开始准备写论文了。

如前所述,大部分学生一直在里昂完成学业。就连实际上是在巴黎接受艾斯嘉拉(Jean Escara)指导的于振鹏,也最终于1939年8月回到里昂答辩。<sup>⑱</sup> 只有在极个别的情况下,学生可以前往外地,在其他大学注册。于是,这21名中国青年也像翟俊千那样,来到中法大学通过测试、请法方秘书代为与法学院沟通,前往法学院注册、上课,申请博士论文写作资格,通过由里昂法学院组织的口试,在里昂教授的指导下完成论文,在里昂的出版社印刷论文,在里昂答辩通过,最终取得学位回国。换言之,这些中国学生在留法期间与里昂法学院关系相当密切。下文将具体分析与里昂的联系对他们思想形成的意义。

与留学生们互动最多的法国学者,自然是他们的导师。有时候,博士论文本身提供了相应的信息。刘懋初、赖国高、陈荣生等人的论文扉页上都印有答辩委员会的名单,其中答辩委员会的主席便是导师。曾锦春、翟俊千、于振鹏、陈延进等人的论文没有提供这些信息,但是他们在致谢中实际上也告诉了我们导师和答辩委员会的组成。那些既没有明示委员会信息也没有前言可以利用的博士论文,有时也在档案中留下了线索。比如,里昂当地报纸 *Tout Lyon* 曾经报道:“我们的同行吴凯声……刚刚出色地完成了论文答辩。委员会主席是朗贝尔教授,成员是拉梅尔(Irénée Lameire)和古恒(Maurice Courant)两位教授。”<sup>⑲</sup> 其他人则在与秘书长古恒的通信中报告了自己的论文选题和指导教师等情况。远在巴黎,最终决定进入巴黎法学院并如愿以偿的夏晋熊,就在1936年6月26日的信中向古恒报告自己在巴黎法学院阿尔及利亚裔教授瓦利德(William Oualid)的指导下完成论文的计划。<sup>⑳</sup> 除了很早就因为政治参与而被除名的陈绍源和此前已经取得博士学位的张祖庚以外,几乎所有中法大学学生的导师信息都可以还原。

表1 中法大学法学博士的选题与指导

姓名	题目 <sup>㉑</sup>	答辩年份	导师	委员会
刘懋初	《1922年英国宣言以来的埃及国际地位》	1925	皮克	朗贝尔、拉梅尔
吴凯声	《中国的宪法问题:1923年10月10日的宪法》	1925	朗贝尔	拉梅尔、古恒
曾同春	《中国的丝绸生产与销售》	1928	戈纳尔	

<sup>⑰</sup> Archives l'Institut Franco-chinois de Lyon, Dossiers Étudiant Numéro 91 (Zeng Jinchun)[A]. Dossier contenant 46 pièces numérotées de 1 à 46 [1921-1929], No. 11.

<sup>⑱</sup> Archives l'Institut Franco-chinois de Lyon, Dossiers Étudiant Numéro 307 (Yu Zhenpeng)[A]. Dossier contenant 49 pièces numérotées de 1 à 49 [1931-1941], No. 46.

<sup>⑲</sup> Archives l'Institut Franco-chinois de Lyon, Dossiers Étudiant Numéro 22 (Wu Kaisheng), Sous-dossier #3[A]. Dossier contenant 146 pièces numérotées de 1 à 146 [1931-1938], No. 56.

<sup>⑳</sup> Archives l'Institut Franco-chinois de Lyon, Dossiers Étudiant Numéro 312 (Xia Jinxiang), Sous-dossier #1[A]. Dossier contenant 86 pièces numérotées de 1 à 86 [1921-1926], No. 95.

<sup>㉑</sup> 葛夫平.中法教育合作事业研究(1912—1949)[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77-80.本文对博士论文题目的翻译基本沿用了葛夫平的翻译,只是在少数法律术语的用法上做了一些修改。

续 表

姓 名	题 目	答辩年份	导 师	委 员 会
黎国材	《对移民的国际管制》	1928	戈纳尔	布维耶、菲利普
曾锦春	《中国工人运动》	1929	菲利普	比耶、特雷武
翟俊千	《中外条约所致中国国际地位之历史与分析》	1929	皮克	戈纳尔、拉梅尔
符传钵	《中国海关制度的历史研究》	1930	戈纳尔	
陈耀东	《中国的土地制度》	1933	菲利普	戈纳尔、佩鲁
彭礼端	《1912—1931年间中国行政组织历史与批判研究》	1933	尼古拉	巴斯蒂、拉梅尔
陈延进	《美国宪法中的间接立法》	1934	朗贝尔	
卢干东	《中国都市生活与市政学》	1934	尼古拉	
钱翔孙	《对上海港的经济研究》	1934	勒布	
赖国高	《上海外汇市场与中国收支平衡的关系》	1935	戈纳尔	菲利普、沙茨
徐复云	《国际联盟对难民的保护》	1935	巴斯蒂	
祝修爵	《法国公务员录用与提拔程序研究》	1935	尼古拉	巴斯蒂、拉梅尔
陈绍源	《在孙中山及其学说影响下中国宪政生活演变》	1937		
夏晋熊	《当代中国货币与银行体系的重建》	1937	瓦利德	
陈 廪	《现代中国公立教育体系的组织与运作研究》	1939	尼古拉	
刘先伟	《抗战前后中国的货币与金融问题》	1940	佩鲁/瓦利德	
于振鹏	《中国习惯法中的贷款》	1940	爱斯嘉拉	
张祖庚	《论中国国籍》	1941		
赵崇汉	《法国行政法上公务员的定义及其法律地位》	1942	巴斯蒂	
陈荣生	《1875年宪法的连署及其在当今法国的运用》	1943	佩鲁	巴斯蒂、里夏多
龙 吟	《中国预算监督：与英法体系的比较》	1943	特雷武 <sup>②</sup>	尼古拉、佩鲁
魏登临	《法国法上的行政裁量权及司法监督》	1944	佩鲁	巴斯蒂、尼古拉

## 二、我手写我心：知识生产过程的自主性

在厘清了这些年轻法学家的选题和指导后,随即产生的问题是:导师人选和题目选择由谁决定?以下将从导师选择、题目选择、游学巴黎三方面入手回答,并揭示中国学生在法国教师和管理者面前掌握自己学业的强烈意愿。

### (一) 导师：行政对学生意志的尊重

不同于主要选择民法的法国学生,留学生们倾向于公法学和当时居于边缘地位的政治经济学。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艰难岁月中,里昂法学院常任教师也不过只有15人左右,基本上一个学科只有一名教授。所以写国际公法的论文,在早年必然接受皮克指导,稍后又肯定会成为巴斯蒂(Suzanne Bastid)的学生;经济学的论文几乎肯定会由戈纳尔指导;尼古拉会指

<sup>②</sup> 龙吟的导师本来是菲利普,但后者在1942年离开里昂前往伦敦加入戴高乐领导的自由法国运动,成为抵抗组织的一员。所以,最后完成指导工作的是特雷武。

导公法的论文,而菲利普几乎包揽了财政学的选题。教师的指导几乎肯定与选题是交织在一起的。

在选择导师的阶段,中国学生、管理层和教师三方面的互动已经清晰可见。和其他大学(学院)的学生不同,中法大学学生在确定导师并与导师正式见面以前,往往先由法方主管写信给教授介绍学生,并咨询教授的意见。在大部分的档案中都可以看到秘书长古恒以行政主管身份给教授写的信件。但是,并不是每位教授都会接受以中法大学名义向他们推荐的学生。比如,古恒曾致信皮克,盛赞曾锦春是一位“严肃、勤奋、永远不会让您失望的学生”。<sup>②③</sup>但是,曾锦春关于中国劳工运动的论文最终并未由法国劳动法的先行者皮克指导。倒是由曾锦春自己在没有问过古恒的情况下选择了导师。<sup>②④</sup>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彭礼端的案例中,古恒不得不主动询问他选择导师的情况。<sup>②⑤</sup>虽然古恒最初向他推荐的导师是朗贝尔,<sup>②⑥</sup>最后实际指导的人却是尼古拉。可见,管理层对学生的指导教师人选只有建议之权,最终跟随何人写作博士论文还要看学生和教师之间的沟通情况。而且在大部分情况下,学生可以说还占据了主动。朗贝尔就曾回忆1924年吴凯声敲开他办公室的大门要求得到帮助时的情景。<sup>②⑦</sup>

相比于留在里昂的学生,要求转学的学生更能表现出中国学生掌握自己学业的愿望。由格勒诺布尔法学院院长勒布(Paul Reboud)指导的钱翔孙、由巴黎法学院教授瓦利德指导的刘先伟和夏晋熊为我们提供了足够的例证。刘先伟还引用法国民法学巨擘卡皮唐(Henri Capitant)在1926年出版的《如何写作法学博士论文》中所说“博士论文写作最难的部分是保持和导师的直接联系”,为自己转学到巴黎大学背书。<sup>②⑧</sup>由此可见,中法大学的留学生对于自己选择的学科和导师有相当的自我意识,并会尽自己所能要求管理层接受。管理层也确实在大部分情况下接受了他们的选择。

## (二) 选论题: 学生与教师的合作

既然导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选题,那么决定博士论文选题的人可以说是决定整篇论文写作过程的人。留学生在选题方面,因为知识、资历的不对等,无法保持选择导师与科目时那种高度自主性也在所难免。卡皮唐在《如何写作法学博士论文》中主张,应该由学生自己根据兴趣和能力主动选择题目。但是,他也承认大部分的学生没有利用好这种学术自由,而只是“请求讲授法学或政治经济学某个部门的教师给他们提供题目,并请他出任答辩主席”。其结果是“答辩主席有时遭遇相当大的尴尬,因为他实际上根本不认识学位候选人,而且对其研究的价值知之甚少”。<sup>②⑨</sup>对于中法大学的学生而言,协会内部的指导又为他们增加了知识不对等之外的另一层行政限制。例如,在古恒写给戈纳尔的信中,他说自己“建议曾同春选择一个和中国有关的主

<sup>②③</sup> Archives l'Institut Franco-chinois de Lyon, Dossiers Étudiant Numéro 91 (Zeng Jinchun)[A]. Dossier contenant 41 pièces numérotées de 1 à 41 [1921-1929], No. 10.

<sup>②④</sup> Archives l'Institut Franco-chinois de Lyon, Dossiers Étudiant Numéro 91 (Zeng Jinchun)[A]. Dossier contenant 41 pièces numérotées de 1 à 41 [1921-1929], No. 19.

<sup>②⑤</sup> Archives l'Institut Franco-chinois de Lyon, Dossiers Étudiant Numéro 171 (Peng Liduan)[A]. Dossier contenant 28 pièces numérotées de 1 à 28 [1925-1933], No. 14.

<sup>②⑥</sup> Archives l'Institut Franco-chinois de Lyon, Dossiers Étudiant Numéro 171 (Peng Liduan)[A]. Dossier contenant 28 pièces numérotées de 1 à 28 [1925-1933], No. 13.

<sup>②⑦</sup> Lambert É. Préface[C]//Woo J, Courant M. Le Problème constitutionnel chinois. La constitution du 10 octobre 1923. Paris: M. Giard, 1925: VIII.

<sup>②⑧</sup> Archives l'Institut Franco-chinois de Lyon, Dossiers Étudiant Numéro 321 (Liu Xianwei)[A]. Dossier contenant 84 pièces numérotées de 1 à 84 [1932-1941], No. 69.

<sup>②⑨</sup> Capitant, H. Comment il faut faire sa thèse de doctorat en droit[M]. Paris: Dalloz, 1926: 18.

题,因为中国学生往往能在这些方面做出原创性的贡献”。<sup>⑩</sup>

即便如此,为数不少的中法大学学生自己选定了研究主题,并获得导师的背书。在1923年9月28日写给里昂法学院比较法学所创始人朗贝尔的信中,古恒写道:“我相信您已经认识吴凯声先生了……他想以最近几部中国宪法的比较研究作为博士论文题目。他已经准备了一些材料,并殷切希望知道您对这一选题的看法。”<sup>⑪</sup>卢干东的确在论文的前言部分说导师尼古拉(Maxime Nicolas)鼓励他写有关中国市政学的论文,并解释了该选题的重要性。<sup>⑫</sup>但是在正式开始写作前,他致信古恒解释自己“向朗贝尔和尼古拉提出了数个选题,最终由尼古拉确定了中国城市生活的题目”。<sup>⑬</sup>古恒本人则在回应中也写道:“对于尼古拉是否认可您的选题,我无缘置喙……只要听您导师的指导就可以了。”<sup>⑭</sup>同样感谢了导师的指导,但是暗示作者本人才是选题人的,还有皮克的学生翟俊千关于中国国际地位的论文、<sup>⑮</sup>曾锦春关于中国工人运动的论文。<sup>⑯</sup>因此,我们应该可以看出,有些留学生利用了当时法国教授对学术自主性的尊重,并且自己决定了研究的主题。

当然,有些学生则或是在导师的建议下改变了题目,或是接受了导师的选题。皮克的另一名弟子刘懋初在他关于埃及国际地位的论文中感谢导师为他指定了一个对中国亦有启发的题目。<sup>⑰</sup>龙吟也坦白,他最初打算写法国财政体系的论文,但是菲利普认为龙吟无法在这个选题上做出富有创见的成果,于是建议他写了现在的题目。<sup>⑱</sup>赵崇汉也说是尼古拉为他建议了选题。<sup>⑲</sup>然而就连在教师推荐的选题之中,仍然可以看见学生自己的影子。比如刘懋初把埃及的国际地位与中国相比,强调皮克推荐的选题对于一名中国学生的特殊意义。<sup>⑳</sup>虽说黎国材国际移民规制的选题来自刚写完《国际移民史》的戈纳尔的推荐,却也动情地自比备受法国恩泽的国际知识移民。<sup>㉑</sup>可见,在大多数情况下,题目的选定是学生、管理者、导师三方沟通与交流后的产物。

古恒和班乐卫(Paul Painlevé)等人视中法大学为培养中国之亲法人士,在中国推广法国知

<sup>⑩</sup> Archives l'Institut Franco-chinois de Lyon, Dossiers Étudiant Numéro 90 (Zeng Tongchun) [A]. Dossier contenant 67 pièces numérotées de 1 à 67 [1921-1927], No. 10.

<sup>⑪</sup> Archives l'Institut Franco-chinois de Lyon, Dossiers Étudiant Numéro 22 (Wu Kaisheng), Sous-dossier # 1 [A]. Dossier contenant 86 pièces numérotées de 1 à 86 [1921-1926], No. 25.

<sup>⑫</sup> Loo K T. La Vie municipale et l'urbanisme en Chine [M]. Lyon: Bosc Frères & Riou, 1934: 8.

<sup>⑬</sup> 1933年2月23日的信件, Archives l'Institut Franco-chinois de Lyon, Dossiers Étudiant Numéro 246 (Lu Gandong) [A]. Dossier contenant 51 pièces numérotées de 1 à 51 [1929-1934], No. 31.

<sup>⑭</sup> Archives l'Institut Franco-chinois de Lyon, Dossiers Étudiant Numéro 246 (Lu Gandong) [A]. Dossier contenant 51 pièces numérotées de 1 à 51 [1929-1934], No. 32.

<sup>⑮</sup> Tchai T T. Essai historique et analytique sur la situation internationale de la Chine Conséquences des traités sino-étrangers [M]. Paris: Paul Geuthner, 1929: 7.

<sup>⑯</sup> Tsing C C. Le Mouvement ouvrier en Chine [M]. Paris: Paul Geuthner, 1929: 5-6.

<sup>⑰</sup> Liu M C. De la condition internationale de l'Égypte depuis la déclaration anglaise de 1922 [M]. Lyon: Bosc Frères & Riou, 1925: 8.

<sup>⑱</sup> Long Y. Le Contrôle du budget en Chine, comparaison avec les systèmes anglais et français [M]. Lyon: Imprimerie générale lyonnaise, 1943: 8.

<sup>⑲</sup> Tchao T H. Étude sur la définition et la situation juridique du fonctionnaire dans le droit administratif français [M]. Lyon: Bosc frères, M. & L. Riou, 1942: V.

<sup>⑳</sup> Liu M C. De la condition internationale de l'Égypte depuis la déclaration anglaise de 1922 [M]. Lyon: Bosc Frères & Riou, 1925: 8.

<sup>㉑</sup> Li K T. Réglementation internationale de l'émigration [M]. Lyon: Bosc Frères & Riou, 1928: 5-7.



识之工具,只要导师和学生双方对选题的看法形成了一致意见,管理方大多选择顺其自然。纪律权威和学生的自主性真正发生剧烈冲突的,还是在涉及学生在何处完成论文这种实际上无关于学术的问题上。

### (三) 去巴黎:学生、导师、管理人员的复杂平衡

在里昂的中国法科学生对自己立场的坚持有时令人印象十分深刻。在广东女生黄明敏的档案中,我们看到了她不顾管理方劝阻,执意前往巴黎,也看到了她与古恒就中法大学是否要支付其在巴黎的生活费将近8年的争执,档案最后结束于她告知学校她已经成为广东上诉法院的法官,要求学校寄送学位证书的信件。<sup>④②</sup>在江苏男生陈洪的105份文件组成的档案中,前半部分是他把盖有大学和协会印章的通知掷于地上受纪律处分引起的各种申辩、听证、商议,后半部分是他因为请病假而给古恒寄去的数十份假条,最终结束于他告知自己已经受聘为南京中央大学副教授,并要求学校寄送学位的来信。<sup>④③</sup>留法博士们的生活虽然没有那么强的戏剧色彩,但其中一些人也多次以个人名义与以古恒为代表的法方管理人员和法学院各教师交涉,其中非常明显地体现了他们自己掌握学习的科目、地点、材料和时间安排的愿望,并折射出了学生、管理人员、教师三个群体之间虽非平等,但绝不能以“支配—服从”一概而论的微妙关系。

其中又以离开里昂,前往巴黎赴自由政治学院(École libre des sciences politiques)学习最能体现学生的能动性。自1877年福州船政局学生马建忠、陈季同入学后,自由政治学院在中国学生中声望很高,<sup>④④</sup>所以中法大学学生中也常见申请前去游学者。1931年,陈耀东、卢干东和赖国高一起提出前往自由政治学院攻读政治经济学课程的申请。奖学金的管理者很快拒绝了他们的申请,并致信里昂法学院若斯兰(Louis Josserand)院长,强调里昂法学院所提供的课程已经能够满足他们的需要。<sup>④⑤</sup>但是,在1932年赖国高通过了资格考试以后,古恒的态度有所转变,并在面谈之后立刻致信自由政治学院的秘书处,询问赖国高前往巴黎考试的时间。<sup>④⑥</sup>而且,管理层最终决定不但资助他参加考试的1500法郎的费用,而且为他在巴黎赶考的半个月提供伙食费。<sup>④⑦</sup>赖国高顺利通过入学考试以后,又取得了整个学年留在巴黎进修的许可。<sup>④⑧</sup>甚至在仅仅及格成绩通过了第一年的考试后,他仍能再次说服古恒允许他留在巴黎学完第二年的课程。<sup>④⑨</sup>夏晋熊则是先以学习法语为理由前往巴黎,然后要求在自由政治学院学习外交学。<sup>⑤①</sup>而主管方竟然也没有对经费问题过多争论,就提出只要夏晋熊获得录取,自然可以获得学费和生

<sup>④②</sup> Archives l'Institut Franco-chinois de Lyon, Dossiers Étudiant Numéro 2 (Huang Mingmin)[1921 - 1931][A]. Dossier contenant 16 pièces numérotées de 1 à 16 [1921 - 1931], Nos. 1 - 16.

<sup>④③</sup> Archives l'Institut Franco-chinois de Lyon, Dossiers Étudiant Numéro 46 (Chen Hong)[A]. Dossier contenant 105 pièces numérotées de 1 à 105 [1921 - 1924], Nos. 1 - 105.

<sup>④④</sup> 朱明哲. 法学知识的跨国旅行: 马建忠和19世纪末的法国法学[J]. 政法论坛, 2020, 38(1): 177 - 191.

<sup>④⑤</sup> Archives l'Institut Franco-chinois de Lyon, Dossiers Étudiant Numéro 265 (Lai Guogao)[A]. Dossier contenant 98 pièces numérotées de 1 à 98, sous-dossier 1 [1929 - 1931], No. 35.

<sup>④⑥</sup> Archives l'Institut Franco-chinois de Lyon, Dossiers Étudiant Numéro 265 (Lai Guogao)[A]. Dossier contenant 98 pièces numérotées de 1 à 98, sous-dossier 2 [1932 - 1933], No. 46.

<sup>④⑦</sup> Archives l'Institut Franco-chinois de Lyon, Dossiers Étudiant Numéro 265 (Lai Guogao)[A]. Dossier contenant 98 pièces numérotées de 1 à 98, sous-dossier 2 [1932 - 1933], Nos. 49 - 51.

<sup>④⑧</sup> Archives l'Institut Franco-chinois de Lyon, Dossiers Étudiant Numéro 265 (Lai Guogao)[A]. Dossier contenant 98 pièces numérotées de 1 à 98, sous-dossier 2 [1932 - 1933], No. 59.

<sup>④⑨</sup> Archives l'Institut Franco-chinois de Lyon, Dossiers Étudiant Numéro 265 (Lai Guogao)[A]. Dossier contenant 98 pièces numérotées de 1 à 98, sous-dossier 2 [1932 - 1933], No. 67.

<sup>⑤①</sup> Archives l'Institut Franco-chinois de Lyon, Dossiers Étudiant Numéro 312 (Xia Jinxiang)[A]. Dossier contenant 146 pièces numérotées de 1 à 146, sous-dossier 2 [1933 - 1935], Nos. 47 - 49.

活费的资助。<sup>⑤①</sup> 夏晋熊在政治学院的表现不如赖国高,在第二学年结束时有3门考试不及格,必须再延期一年。<sup>⑤②</sup> 即便如此,他继续在巴黎学习的申请仍然获得批准。

但是,同样希望前往巴黎的徐复云、陈延进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其中又以陈延进的经历最为曲折,在学完了国际公法和国际私法的课程后,他于1932年申请去政治学院学习外交学,并详细解释了自己的心路历程,还承诺中山大学将会在经费上给予协助。<sup>⑤③</sup> 此事后因其本人财政困难而作罢。随后,古恒与朗贝尔联系,说服后者指导陈延进写作关于美国宪法的博士论文。<sup>⑤④</sup> 但陈延进并未灰心,于1933年9月旧事重提。<sup>⑤⑤</sup> 秘书处最终以其应首先完成论文写作为由拒绝了他的要求。<sup>⑤⑥</sup> 于是陈延进先完成了论文,并于1934年4月写了一封4页的长信,信中列举夏晋熊、赖国高、陈耀东等人的先例,要求“循例”允许其入学政治学院,甚至在信中指出夏晋熊可能连学习证书都拿不到,居然也能获得学校支持,从而反证自己要求的合理性。<sup>⑤⑦</sup> 可惜,他的诉请最终既未能得到管理方的认可,亦未能说服导师朗贝尔为其背书,所以仍未能如愿。

在学生是否能前往外地的问题上,管理方的决定往往出于纪律考虑而非学术必要。中法大学规定学生的住所里昂,所以管理层认为拒绝他们前往巴黎的请求理所当然。<sup>⑤⑧</sup> 对于那些导师本人无法发挥太多影响的事项,如考勤、住宿,管理者表现得更为敏感和严格。任何一次前往外地的申请,任何一次延期回国的尝试,就算无关于额外的费用,也会首先在管理者眼中变成对权威的挑战,从而招致制裁。就连那些最终获得批准的申请也不例外。顺利获得批准,如愿在巴黎常住的赖国高,也因为在1933年9月19日离开里昂时没有向古恒报告而受到纪律警告。<sup>⑤⑨</sup> 管理方对学生的纪律要求是具体而微的,独立于其学业进展状况的。他们希望全面掌握学生身在何地,与哪些老师来往,所学科目等各方面的信息。但是,在学业问题上,如果教师与学生达成一致,管理者一般也只好听之任之。例证之一就是当巴黎的教授瓦利德先后致信古恒,表示认可夏晋熊和刘先伟的学术水平、愿意指导他们的论文后,<sup>⑥⑩</sup>中法大学方面便未再加阻拦。

⑤① Archives l'Institut Franco-chinois de Lyon, Dossiers Étudiant Numéro 312 (Xia Jinxiang)[A]. Dossier contenant 146 pièces numérotées de 1 à 146, sous-dossier 2 [1933-1935], Nos. 50-51.

⑤② Archives l'Institut Franco-chinois de Lyon, Dossiers Étudiant Numéro 312 (Xia Jinxiang)[A]. Dossier contenant 146 pièces numérotées de 1 à 146, sous-dossier 2 [1933-1935], No. 89.

⑤③ Archives l'Institut Franco-chinois de Lyon, Dossiers Étudiant Numéro 290 (Chen Yanjin)[A]. Dossier contenant 61 pièces numérotées de 1 à 61, sous-dossier 1 [1931-1933], No. 10.

⑤④ Archives l'Institut Franco-chinois de Lyon, Dossiers Étudiant Numéro 290 (Chen Yanjin)[A]. Dossier contenant 61 pièces numérotées de 1 à 61, sous-dossier 1 [1931-1933], Nos. 18-28.

⑤⑤ Archives l'Institut Franco-chinois de Lyon, Dossiers Étudiant Numéro 290 (Chen Yanjin)[A]. Dossier contenant 61 pièces numérotées de 1 à 61, sous-dossier 1 [1931-1933], No. 29.

⑤⑥ Archives l'Institut Franco-chinois de Lyon, Dossiers Étudiant Numéro 290 (Chen Yanjin)[A]. Dossier contenant 61 pièces numérotées de 1 à 61, sous-dossier 1 [1931-1933], No. 30.

⑤⑦ Archives l'Institut Franco-chinois de Lyon, Dossiers Étudiant Numéro 290 (Chen Yanjin)[A]. Dossier contenant 61 pièces numérotées de 1 à 61, sous-dossier 2 [1934-1947], Nos. 50-54.

⑤⑧ Règlement fixant le fonctionnement de l'Institut franco-chinois de l'Université de Lyon.

⑤⑨ Archives l'Institut Franco-chinois de Lyon, Dossiers Étudiant Numéro 265 (Lai Guogao)[A]. Dossier contenant 98 pièces numérotées de 1 à 98, sous-dossier 2 [1932-1933], Nos. 76-78.

⑥⑩ Archives l'Institut Franco-chinois de Lyon, Dossiers Étudiant Numéro 312 (Xia Jinxiang)[A]. Dossier contenant 146 pièces numérotées de 1 à 146, sous-dossier 3 [1936-1938], No. 96; Archives l'Institut Franco-chinois de Lyon, Dossiers Étudiant Numéro 321 (Liu Xianwei)[A]. Dossier contenant 84 pièces numérotées de 1 à 84 [1932-1941], No. 70.

### 三、中国的命运：知识生产内容的自主性

在中法大学学生所撰写的 25 本博士论文中,有 15 篇直接以“中国”作为研究对象,就连“中国”并没有直接出现的论文中,“中国”的形象仍然隐约可见。这些研究中,两个主题尤为明显:其一,是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其二,是经济发展导致的社会问题。

#### (一) 国际秩序中的中国

“我们的祖国长期经历着不幸,如今正在迈向新的地平线,我们为它争取‘存在的权利’。”<sup>①</sup>在表达了对巴黎和会未能彻底废除中国与列强之间的不平等条约的失望后,翟俊千以这句话结束了他关于中国国际地位的博士论文。一个不平等国际秩序之中的文明古国——这就是翟俊千在不厌其烦地逐条讨论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后,向读者展示的形象。但是,这一饱受屈辱的古国在世界大战中是胜利的一方,并且以自身的努力和牺牲证明其有能力,也有权利要求他国之平等对待。<sup>②</sup>此时,中国站在了两种不同命运的门槛前,中国青年的任务便是帮助这一文明古国摆脱过去的屈辱,成为国际社会的平等一员。同样的主题在刘懋初关于埃及国际地位的论文中也有回响:“法国一直是埃及真诚的朋友。而中国和埃及一样作为文明古国,也对后者抱有深切同情,毕竟两者处境之间有不少相似性,所以中国也希望这位‘长妹’可以早日实现其国家独立的合法愿望。”<sup>③</sup>两篇论文关于中国和埃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巴黎和会中命运的叙事结构高度一致。同样在战前是列强支配下的文明古国,同样希望把握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机会谋求独立自强,同样在巴黎和会中经历建设平等国际社会理想的幻灭,最后仍处于半殖民状态。<sup>④</sup>国际秩序本身的不平等岂不昭然若揭。

然而,正是在这种不平等的现实中,中法大学的留学生开始构想一种更加公平的国际合作秩序。黎国材意识到“勤勉、坚毅而适应性强”的中国劳工只能在欧洲各国或者殖民地“从事最为艰苦的劳动,领取微薄的工资,以至于这些劳工对情况颇为不满,一旦合同期满就迫不及待要回国”,但雇主又不愿意失去这么高效的劳动力,所以强迫劳动、黑工等现象时常发生。<sup>⑤</sup>为了解决这种矛盾,有效的国际合作平台必不可少,而国联则提供了一个可能的机制,因为这一机构的发展已经揭示“民族国家的主权并不是绝对和不受限制的,而是相对的、受限制的、由道德和法律的一般规则所调整的”。<sup>⑥</sup>

在当时留法学生眼中,虽然“大国政治有时导致国际联盟的崇高理想落空”,<sup>⑦</sup>虽然中国在巴黎和会中并未得到公正对待,却也不妨继续沿着现有的道路建设国际社会,而且中国最终

① Tchai T T. Essai historique et analytique sur la situation internationale de la Chine Conséquences des traités sino-étrangers[M]. Paris: Paul Geuthner, 1929: 211.

② Tchai T T. Essai historique et analytique sur la situation internationale de la Chine Conséquences des traités sino-étrangers[M]. Paris: Paul Geuthner, 1929: 210.有趣的是,翟俊千并没有像当时法国国际公法学的权威观点那样,把巴黎和会看作对“不正义”一方的惩罚,而是延续了 19 世纪末国际法的观点,认为战胜方有权要求战败方赔偿。这种立场不能说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完全没有市场,但它确实无法说明为何中国可以要求同为战胜方的其他国家放弃在中国之特权。

③ Liu M C. De la condition internationale de l'Égypte depuis la déclaration anglaise de 1922[M]. Lyon: Bosc Frères & Riou, 1925: 8.

④ Liu M C. De la condition internationale de l'Égypte depuis la déclaration anglaise de 1922[M]. Lyon: Bosc Frères & Riou, 1925: 208 - 209.

⑤ Li K T. Réglementation internationale de l'émigration[M]. Lyon: Bosc Frères & Riou, 1928: 67.

⑥ Li K T. Réglementation internationale de l'émigration[M]. Lyon: Bosc Frères & Riou, 1928: 198.

⑦ Hsu F Y. La Protection des réfugiés par la Société des Nations[M]. Lyon: Bosc frères, M. & L. Riou, 1935: 130.

将在其中谋得与其贡献相符的地位。易言之,从国际层面看,致力于建设一个有力协调各国行动的机构,以正义的国际法保证和平和公正的想法本身是值得努力的,所需要考虑的只是具体细节上的技术问题;从中国的角度看,通过国家的现代化参与新的国际社会建设,也无疑是青年人所需要实现的目标。张祖庚很好地总结了这种乐观主义观念:“中国为了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强权,就必须在完成其他任务的同时,继续追随着国际私法的新发展,因为这一法律部门在国与国关系的发展当中扮演着异常重要的角色。”<sup>⑥</sup>此时是1941年,且不说抗日战争早已爆发,法国本土也早已陷入了战争的泥潭,如此情境下仍能保持乐观情绪,实在令人印象深刻。

这种乐观情绪自然反映了欧洲法学界在战争阴云之下仍未消散的理想主义思潮,但强权政治的阴影始终挥之不去。在这个意义上,学生倒是比他们的导师更清醒。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经济史充斥着衰退、萧条和贸易保护主义,然而这些坏消息似乎从未传入法学家那里,特别是国际法学家的书房。法国的国际法学家继续高谈阔论建立欧洲联盟以实现永久和平的可能,<sup>⑦</sup>前往各个国家讲课的民法学家则仍以为国际贸易的发展会让国家放弃战争,并让各国法律进一步趋同,<sup>⑧</sup>而法律统一则能进一步促进国际的合作而非战争。相比之下,中国学生的论文则在高声表达对这种理想的赞同后,往往再提醒人们,以上正义国际社会的理想必须建立在各国实力相近的前提之上。正因为如此,钱翔孙一方面强调上海港能够联通中国与世界市场本身是不平等条约的结果,另一方面试图说服人们相信自由贸易才是最好的政策。因为如果其他国家贯彻贸易保护主义,不向中国的产品开放他们的市场,那么通过国际商业合作实现共同繁荣就不过是画饼而已。<sup>⑨</sup>他也意识到,如果中国国力孱弱,又如何使他国开放市场。国家力量的不平等最终会让由平等国家组成国际社会的理想成为镜花水月。

正是对国家间力量对比不平等的意识,引导前往里昂的中国学子关心财政学和政治经济学,并自然而然地进入20世纪法国法学讨论的另一个议题:社会问题。

## (二) 中外比较下的“社会问题”

在法国的语境下,“社会问题”指的往往是贫困、贫富差距拉大、罢工、社会不稳定性增强等现象。20世纪初中国的工业化程度、城市化程度远低于法国,所以那些“因工业化而生”的社会现象未必真的在中国特别具有代表性。但是,中法大学的学生们认为中国不仅同样面对贫困、犯罪、劳资冲突等问题,甚至可能因为其不利的国际地位而无力面对这些挑战。于是,对欧美各国有利的自由贸易就可能成为中国进步的桎梏。曾锦春就说:“让中国获得完美的商业环境,发展工业并迅速成为可以与之竞争的力量并不符合欧洲列强的利益。他们致力于通过殖民条约让中国受制于最极端的重商主义政策。”<sup>⑩</sup>于是,中国欲自强,必致力于摆脱列强所加之枷锁,也就必先自强。卢干东也指出,中国城市虽然发展程度远低于欧美,却也面临着公路和市政建设、街区发展不均衡、医疗与公共卫生等问题。<sup>⑪</sup>然而这名日后执教于中山大学和武汉大学的留学生或有意或无心地隐去了相似的问题在欧美和中国出现的不同背景。在法国,人们把社会问题归咎于自由放任主义的经济和社会政策。而在中国,至少卢干东所指出的那些社会现象更像是

<sup>⑥</sup> Chang C K. Essai sur la nationalité chinoise[M]. Paris: Durand, 1941: 145.

<sup>⑦</sup> Guieu J M. Les juristes internationalistes français, l'Europe et la paix à la Belle Époque[J]. Relations Internationales, 2012, 149(1): 27-41.

<sup>⑧</sup> Demogue R. L'unification internationale du droit privé; leçons faites à la Faculté de Buenos-Ayres[M]. Paris: Rousseau, 1927: 128.

<sup>⑨</sup> Ts'ien S S. Le Port de Shanghai: étude économique[M]. Lyon: Bosc Frères & Riou, 1934: 152.

<sup>⑩</sup> Tsing C C. Le Mouvement ouvrier en Chine[M]. Paris: Paul Geuthner, 1929: 7-8.

<sup>⑪</sup> Loo K T. La Vie municipale et l'urbanisme en Chine[M]. Lyon: Bosc Frères & Riou, 1934: 11.

国家刚开始迈向现代化时能力不足所致。然而对于这些年轻人,重要的或许不是现象背后原因的不同,而是现象本身的相似。

至于如何用法律解决社会问题,留学生们提出了两种表面上颇为不同的主张。最早的学生对国家更多抱有一种不信任的态度,更晚一些的学生则倾向于认为强国即可富民。

作为中法大学最早的学生之一的曾锦春曾指责辛亥革命以来历届政府“不稳定、弱小、分裂,对维持权力以外的事务毫不关心,也既不会考虑,又无力推行为工薪阶级谋利益的干预政策”。<sup>⑦④</sup>而且通过建立强大政府来规制社会也不值得期待,因为“一个管理个人之间关系的中央集权国家概念对于中国实在太陌生,不可能在大范围内马上得以落实”。<sup>⑦⑤</sup>既然政府贫弱,那么工人就只能指望自己和发动社会运动的工会组织。<sup>⑦⑥</sup>他进一步指出中国工人缺乏组织,四分五裂,所以需要有一个全国范围内的总体组织者——国民党。<sup>⑦⑦</sup>

到了20世纪30年代,在曾锦春笔下还无疑是一个革命政党形象的国民党已经演变为似乎可以掌握权力的执政党了。他认为,国民党不但是社会问题的解决者,也是社会理想的定义者,所需要问的不过是通过何种渠道可以增强其解决问题的能力而已。陈耀东主张:“私人的土地所有权只不过是一种社会事实,和其他所有社会事实一样服从进步律。”<sup>⑦⑧</sup>现在,社会进步要求民生主义之“平均地权”的主张在国民政府的推动下实现。<sup>⑦⑨</sup>一旦地权平均,财富分配不均这一中国最大的经济问题也就可以解决。<sup>⑦⑩</sup>不过,他也强调,“到底中国土地产权何时才能回归共产主义的黄金时代,完全取决于国民政府的效率”。<sup>⑦⑪</sup>这种建立强大的中央政府,以法律为工具实现人民呼声的想法相当具有代表性。陈延进也认为正是由于美国国会的立法权远远超过了最初联邦制宪法的设计,美国才终于有能力贯彻致力于提高道德、公共卫生和整体福利的一系列立法政策。<sup>⑦⑫</sup>在他看来,这一系列规制商业和社会生活的立法正是民心之所向。所以,他指责联邦最高法院仍坚持自由放任法律传统,倾向于判决这些社会立法无效,并建议法院应该和立法机关一样追随“公共意见和全国权力集中化的潮流”。<sup>⑦⑬</sup>

于是,提高行政和财政能力不但成了强国的法宝,同时也是富民的良方,所以他们论文中的两个主题在提高国家能力方面找到了交汇点。更何况,虽说社会问题是一国之内的问题,人们仍然认为解决社会问题可以依赖于国际合作。从曾同春的论文中可以看出,丝业的成功不仅是中国在国际市场地位的问题,还关涉“千千万万从事丝绸工业的不同领域之人民的生计”。<sup>⑦⑭</sup>而为了改良中国丝绸的制造和丝业工人的生产生活条件,又不得不加强国际合作,特别是中法之间的合作。法国可以通过合作获得优质的产品和情报,从而与美国分庭抗礼,而中国则可以借

<sup>⑦④</sup> Tsing C C. *Le Mouvement ouvrier en Chine*[M]. Paris: Paul Geuthner, 1929: 146 - 147.

<sup>⑦⑤</sup> Tsing C C. *Le Mouvement ouvrier en Chine*[M]. Paris: Paul Geuthner, 1929: 150.

<sup>⑦⑥</sup> Tsing C C. *Le Mouvement ouvrier en Chine*[M]. Paris: Paul Geuthner, 1929: 151.

<sup>⑦⑦</sup> Tsing C C. *Le Mouvement ouvrier en Chine*[M]. Paris: Paul Geuthner, 1929: 155 - 157.

<sup>⑦⑧</sup> Chen Y T. *Le Régime agraire en Chine*[M]. Lyon: Bosc frères, M. & L. Riou, 1933: 212.

<sup>⑦⑨</sup> Chen Y T. *Le Régime agraire en Chine*[M]. Lyon: Bosc frères, M. & L. Riou, 1933: 213.

<sup>⑦⑩</sup> Chen Y T. *Le Régime agraire en Chine*[M]. Lyon: Bosc frères, M. & L. Riou, 1933: 210.

<sup>⑦⑪</sup> Chen Y T. *Le Régime agraire en Chine*[M]. Lyon: Bosc frères, M. & L. Riou, 1933: 214.

<sup>⑦⑫</sup> Chan Y C. *La Législation par ricochet dans le droit constitutionnel américain*[M]. Lyon: Bosc frères, M. & L. Riou, 1934: 9.

<sup>⑦⑬</sup> Chan Y C. *La Législation par ricochet dans le droit constitutionnel américain*[M]. Lyon: Bosc frères, M. & L. Riou, 1934: 82.

<sup>⑦⑭</sup> Tsing T C. *De la production et du commerce de la soie en Chine*[M]. Paris: Librairie orientaliste P. Geuthner, 1928: 195.

此获得更好的技术和对法国市场的占有率,从而在与日本丝业的竞争中保持优势。<sup>⑤</sup>于是,在中法大学学生的笔下,国家成了国际社会和国民之间的中介,它参与国际合作以求自强,并同时在国际合作中增进人民的福利。这种观念显然也是和上文所述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乐观主义情结分不开的。

#### 四、里昂与中国之间的法学教育

##### (一) 理解学术史中的“交流”

现有文献在强调中国与西方的对立关系时,既淡化了西方思想之间的竞争关系,又简单地把中国学子看作知识权力的被动客体,忽视其在互相竞争的西方思想之间主动拣选的功效。其实,中国知识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已经意识到“西方”的分裂和多元性。<sup>⑥</sup>蔡枢衡也早就指出,留学不同国家的中国学生在回国后以其留学目的国的知识互相竞争,希望成为中国各新法典权威的解释者。<sup>⑦</sup>再者,中国留学生到底接受何种知识,其实既取决于外国教师为他们提供的选择,又取决于他们对中国和世界之状况的体验与反思。<sup>⑧</sup>关于东方的知识对于欧美学者巩固当时以西方秩序为蓝本建立的法学体系确实有所帮助,但不同法律体系的比较毕竟也有限地促进了对欧美法律之局限性的反思。<sup>⑨</sup>

所以,中法法学史上的“交流”无法简化为一方强加、另一方被动接受的过程。它是一场发生在具体历史语境中的对话。对话双方虽然可能并不平等,但他们都对自己所处的位置有所省察,并且努力理解对方话语传达的意思和弦外之音,同时根据双方的关系以及与语境中其他言说者的关系,策略性地回应。他们的对话又不断改变着言说者在作为客观结构之权力关系中的地位。一言以蔽之,在法学交流中,各种作者以言行事的特征尤为明显。所以,要理解中法大学留学生的经验,我们就要知道他们所学究竟由哪一种声音诉说,他们所感又是出于何种考虑。

##### (二) 里昂法学院：法学变革中的异类

1875年才成立的里昂法学院在19世纪末的法国法学变革中,有着独特地位和作用,以至于人们不应把它等同于其他法国外省法学院。从其建立开始,里昂法学院就以其激进色彩闻名,今日亦然。<sup>⑩</sup>20世纪初,法国法学革新因应对社会、政治、知识三重挑战而生,置身其中的里昂法学院持斗争法律观。中法大学学生之所以倾向于社会主义与进步主义,正是因为这一斗争法律观。

斗争法律观主张以社会改革法律,强调对政治生活的参与,并支持法学对社会科学的开放,从而不同于在其他法学院占优势的一种“平息斗争”的法律观。<sup>⑪</sup>法国法学在1900年前后面对

<sup>⑤</sup> Tsing T C. De la production et du commerce de la soie en Chine[M]. Paris: Librairie orientaliste P. Geuthner, 1928: 196-200.

<sup>⑥</sup> 罗志田. 西方的分裂: 国际风云与五四前后中国思想的演变[J]. 中国社会科学, 1999(3): 20-35.

<sup>⑦</sup> 蔡枢衡. 中国法理自觉的发展[M].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5: 98-99.

<sup>⑧</sup> 朱明哲. 东方巴黎: 略论二十世纪上半叶法国法律学说在中国的传播[J]. 北大法律评论, 2014, 15(2): 581-606.

<sup>⑨</sup> 对比较法历史的整体检讨, 参见 Kennedy D. The Methods and the Politics[C]//Legrand P, Munday R. Comparative Legal Studies: Traditions and Transi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345-433. 对法国比较法学普世主义心态的个案研究, 参见 Jamin C. Le vieux rêve de Saleilles et Lambert revisité. À propos du centenaire du Congrès international de droit comparé de Paris[J]. Revue internationale de droit comparé, 2000, 52(4): 733-751. 并参见朱明哲. 中国近代法制变革与欧洲中心主义法律观: 以宝道为切入点[J]. 比较法研究, 2018(1): 155-170.

<sup>⑩</sup> Kaluszynski M. Sous les pavés, le droit: le mouvement “Critique du droit” ou quand le droit retrouve la politique[J]. Droit et société, 2011, 76(1): 523-541.

<sup>⑪</sup> 两种观念在“自然法”概念上的体现, 参见朱明哲. 面对社会问题的自然法: 论法律社会化中的自然法学说变迁[J]. 清华法学, 2017(6): 75-99.

“社会批判”和“社会学批判”时,<sup>⑫</sup>在法律渊源理论上抛弃了立法至上主义,在法律解释理论上抛弃了文义主义。<sup>⑬</sup>当时刚成立的里昂法学院首先因其社会主义的政治倾向不同于其他法国法学院。在巴黎法学院,占据支配地位的是那些主张法律无关于道德和传统的共和主义法学家。<sup>⑭</sup>在外省法学院,大部分的教授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sup>⑮</sup>前者为第三共和国的自由放任经济政策辩护,而后者则试图维护《民法典》的权威,双方都不认为任由阶级斗争实现无产阶级的民法是一个好的选择。相反,里昂法学院则集中了当时几乎所有同情社会主义的法学家。在1913年到1935年间出任院长的若斯兰就提倡以权利相对理论取代个人主义色彩过浓的所有权绝对和合同自由观念。<sup>⑯</sup>在1901年到1936年间担任民法学教授的莱维(Emmanuel Lévy)更是公开的社会主义者、法律社会主义最重要的倡导者、工人国际法国分部的省代表。<sup>⑰</sup>而且,就在中法大学创立之初,以吴凯声为代表的中国学生已经常常去旁听莱维的课程。<sup>⑱</sup>刘懋初和翟俊千的导师皮克虽然是国际法学家,但也是法国最早主张保护工人利益的法学家和社会法的先驱。<sup>⑲</sup>不同于其他意识到需要改革法学以回应社会问题的法学家,他们共同的认识是要从根本上把法律从个人本位转变为社会本位,而且这种社会化应该由群众、人民引导法学家完成,而非相反。

在这种独特的法律观指引下,里昂法学院自然也接受了一种对社会科学更为开放的态度。与意图引导和规制社会的法学不同,社会科学观察社会运动、聆听社会呼声,并提倡用社会需要改造法律。其中最激进的莱维认为根本不存在法学,法律无非是社会的信念而已,法学家唯一的工作便是观察社会信念,并将其以法律的公式表达。<sup>⑳</sup>皮克不同意莱维的立场,他认为真正的法学仍然存在,只不过无法独立于社会科学而已。<sup>㉑</sup>院长若斯兰虽然在关于法学和社会科学的论战中保持沉默,但他明确对古恒表示赖国高等从政治经济学毕业的学生也可以写作法学博士论文。<sup>㉒</sup>里昂的法学家们对社会问题的反应如此独特,以至于他们共同认为,法学家在科学实践中可以借道社会科学。为了最大程度增进其学说研究,里昂法学院及其成员自愿与社会知

<sup>⑫</sup> Audren F. Le “moment 1900” dans l’histoire de la science juridique française. Essai d’interprétation [C]// Jouanjan O, Zoller É. Le “moment 1900”: Critique sociale et critique sociologique du droit en Europe et aux États-Unis. Paris: Panthéon Assas, 2015: 55 - 74.

<sup>⑬</sup> Jestaz P, Jamin C. La doctrine [M]. Paris: Dalloz, 2004: Chapitre III.

<sup>⑭</sup> Milet M. La Faculté de droit de Paris sous la Troisième République; une domination sans partage ? (1879 - 1939) [C]// Halpérin J L. Paris, capitale juridique (1804 - 1950): Étude de socio-histoire sur la Faculté de droit de Paris. Paris: Rue d’Ulm, 2011: 143 - 176.

<sup>⑮</sup> Audren F. La belle époque des juristes catholiques (1880 - 1914) [J]. Revue Française d’Histoire des Idées Politiques, 2008, 28(2): 233 - 271.

<sup>⑯</sup> Fenouillet D. Louis Josserand (1868 - 1941) [J]. Revue d’Histoire des Facultés de droit et de la science juridique, 1996, 17: 27 - 45; Audren F, Fillon C. Louis Josserand ou la construction d’une autorité doctrinale [J]. Revue trimestrielle de droit civil, 2009, (1): 39 - 76.

<sup>⑰</sup> Herrera C M. Le socialisme juridique d’Emmanuel Lévy [J]. Droit et société, 2004, 56 - 57(1): 111 - 128.

<sup>⑱</sup> 古恒给莱维的信,见 Archives l’Institut Franco-chinois de Lyon. Dossiers Étudiant Numéro 22 (Wu Kaisheng), Sous-dossier # 2 [A]. Dossier contenant 146 pièces numérotées de 1 à 146 [1931 - 1938], No. 31.

<sup>⑲</sup> Bayon, D, Frobert L. Lois ouvrières et réformisme social dans l’œuvre de Paul Pic (1862 - 1944) [J]. Le Mouvement Social, 2002, 201(4): 53 - 80.

<sup>⑳</sup> Lévy E. Les droits sont des croyances [J]. Revue trimestrielle de droit civil, 1924, 23: 59 - 61.

<sup>㉑</sup> Hakim N. La science de la question sociale de Paul Pic ou les malheurs de l’hétérodoxie dans les facultés de droit [A]. Hakim, N. et Melleray, F. Le renouveau de la doctrine française [C]// Les grands auteurs de la pensée juridique au tournant du XXe siècle. Paris: Dalloz, 2009: 123 - 158.

<sup>㉒</sup> Archives l’Institut Franco-chinois de Lyon. Dossiers Étudiant Numéro 265 (Lai Guogao) [A]. Dossier contenant 98 pièces numérotées de 1 à 98, sous-dossier 1 [1929 - 1931], No. 39.

识和学科联姻。<sup>⑩</sup>

中法大学设在里昂本身有希望学生远离政治活动的考虑。然而事与愿违,中国留法学生在里昂遇到的却是一个以激进社会主义为标志的教授群体。例如,指导了4名中国博士的戈纳尔左右了整个20世纪上半叶该校经济学的发展。这名经济史学家认为理论来自对社会事实的观察,而且本身就是一种社会事实,在实践中发挥着作用。他还主张最有效的经济政策就是国际自由贸易。<sup>⑪</sup> 菲利普在经济学上支持社会主义学说和政府干预的立场,同时他也是工人国际法国分部的地区代表。<sup>⑫</sup> 巴斯蒂则是法国第一名取得公法学教授资格的女性,1946年成为巴黎法学院第一名女性教授,在指导徐复云的时候比学生还要年轻。这位国际组织法权威同时也是一名进步主义者,特别是在对妇女权利的国际法保护方面贡献颇多。<sup>⑬</sup> 可见,当时与中国学生接触最多的教授都是对国际合作持乐观态度,认为国家应该干预经济以解决社会问题的学者。当时给多名中国学生上课的朗贝尔和院长若斯兰更是上述观念在法国学界的重要代表。

作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法国法学变革中的异类,里昂的法学家们对社会变革和社会科学都表现出了更开放的心态。他们的思想和偏好又通过体制性的关系影响学生。比较法学研究院主管朗贝尔和法学院院长若斯兰自不待言,其他的教授则通过授课和论文指导,具体而微地引导中国学生接受他们的知识体系和政治倾向。就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留学生接受了社会主义和进步主义的思想意识。

### (三) 投向祖国的目光

留学生们往往急于论证他们在里昂学到的进步思想就是当前中国问题的解决之道。本来,中国留法学生的博士论文选题大部分都与中国的法律实践相关。<sup>⑭</sup> 吴凯声和郑毓秀几乎同时完成了关于中国宪法的博士论文,而且主要研究的都是在论文刚写完就失效的1923年《中华民国宪法》。甚至如果不是朗贝尔劝阻,吴凯声的论文题目也会和郑毓秀一样是“中国的宪法运动”。随着留法学生人数的增多,可以发现他们的博士论文对中国政治的变迁极其敏感。比如在1936年分别于图卢兹和里昂答辩通过的有关宪法的两篇论文,都一直写到了1935年的宪法发展。<sup>⑮</sup> 对时局的关心甚至可能左右论文选题和导师的选择。彭礼端在给古恒的信中详细解释了自己为何最终没有选择在皮克的指导下写作国际法的论文。<sup>⑯</sup> 按照他的说法,本来皮克已经决定指导他,但是正当自己要把已经写好的两章拿给皮克看的时候,日本侵华战争爆发。而皮克认为南京政府无力应对日本侵略,所以主张彭礼端如果要在论文中讨论战争问题,必须把进一步割地赔款以求议和作为解决方案。这种建议令他无法接受,遂决定更换导师和题目。

留学生普遍表现的另一个特点是对政治立场的敏感。在20世纪30年代,留学生在博士论

<sup>⑩</sup> Audren F. Comment la science sociale vient aux juristes? Les professeurs de droit lyonnais et les traditions de la science sociale (1875 - 1935) [C]//David D. Le renouvellement des sciences sociales et juridiques sous la IIIe République. La Faculté de droit de Lyon. Lyon: La Mémoire du droit, 2010: 3 - 50.

<sup>⑪</sup> Potier J P. L'enseignement de l'histoire des doctrines économiques à la Faculté de droit de Lyon (1895 - 1944) [J]. Revue d'histoire des facultés de droit et de la science juridique, 1998, 19: 285 - 313.

<sup>⑫</sup> Potier J P. L'enseignement de l'histoire des doctrines économiques à la Faculté de droit de Lyon (1895 - 1944) [J]. Revue d'histoire des facultés de droit et de la science juridique, 1998, 19: 285 - 313.

<sup>⑬</sup> Vignes D. In memoriam: Madame Bastid, 1906 - 1995 [J]. Annuaire Français de Droit International, 1994, 40 (40): 7 - 9.

<sup>⑭</sup> 王伟. 中国近代留洋法学博士考(1905 - 1950)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 295 - 299.

<sup>⑮</sup> Cheng Y C. Les Principaux mouvements constitutionnels en Chine, de 1897 à 1935 [M]. Lyon: P. Ferréol, 1936; Ho J C. Histoire constitutionnelle de la Chine Toulouse [M]. Toulouse: Ch. Dirion-G. Labadie, 1936.

<sup>⑯</sup> Archives l'Institut Franco-chinois de Lyon : Dossiers Étudiant Numéro 171 (Peng Liduan) [A]. Dossier contenant 28 pièces numérotées de 1 à 28 [1925 - 1933], No. 17.



文中常常混淆法律规范和意识形态。这种敏感性背后同样折射出当时法科留学生对法学的理解。对于他们而言,法学恰恰不像当时占主流地位的巴黎教授所强调的那样,由一系列规则和解释技术构成,而是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不断变化的产物。对于那些在里昂的学生而言,他们所能接触到的那些对国际化开放程度较高,对社会科学有更多包容性的教师逐渐将他们引向了政治经济学和财政学等“因时置变之实学”。就连那些前往巴黎,以法律整体秩序解释某个条文为选题的学生,往往也受外省法学院那些更少法条主义色彩的理论吸引。<sup>⑩</sup>其中,里昂法学院所推崇的“法律社会化”就是一个相当吸引人的主张。<sup>⑪</sup>

实际上,留学生们对时局的看法往往既不同于西方的主流学界,又不同于当时国内的同胞。他们对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讨论最酣的领事裁判权撤废的观点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鸦片战争之后,列强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在中国领土上确立了领事裁判权。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作为战胜国的中国意欲恢复司法主权,1921年的华盛顿会议也承诺组织“中国调查法权委员会”,然而该委员会直至1926年方成行,而且以中国司法尚未独立为由拒绝了国民政府的要求。<sup>⑫</sup>诚如前文所言,中法大学的博士生既对中国无法成为国际社会平等一员,彻底收回司法主权感到失望,又仍然相信国联主导之下的国际秩序终归会承认中国已经成为强大的文明国家,从而恢复其应有的地位。相比之下,中国法政和舆论界反应更加激烈,普遍把领事裁判权的存续看作国耻,并且对委员会的调查结果普遍持失望与痛恨之情。<sup>⑬</sup>而对于欧美学者而言,对这种国耻当然难以共情,甚至大部分人关心的仍是以欧洲为中心的国际秩序。所以作为国民政府顾问的法国法学家宝道才会建议中国法学家和司法人员多一些耐心,采取渐进的方法收回司法主权。<sup>⑭</sup>威格莫尔甚至十分困惑为什么中国留学生竟然如此急迫地要废除这一帮助中国文明开化的制度。<sup>⑮</sup>对于留学生而言,在这两种立场之间找到一个平衡,从而让自己的声音能够为导师接受,无疑是十分重要的。

中法大学的学生对祖国命运的讨论更多表现出留学生的共性。他们即便在沐浴欧风美雨的同时,眼光仍然时刻投向国内的政治和社会变革。而这一选择背后的原因,自然有关于中国法的研究相较于其他议题更容易完成,也更容易获得教授的首肯,但或许也有助于他们自己回国后发展的考虑。本文所关注的中法大学博士生为公费生或受中法大学委员会资助,他们毕业后有回国的义务,所以不得不为在国内的前途做打算。以最新的欧美先进理论来解决最前沿的中国实践问题,显然就成了一个相当具有吸引力的方案。

## 结 论

吴稚晖等人选择里昂是对当时里昂经济、社会、文化生活之通盘考虑的结果。当时在里昂交汇的并非抽象、不需要加任何历史限定的“中国法学”或“法国法学”,而是正在寻求最先进之西方法学理论的中国法学和正在重新构建自身的法国法学。两种学术追求的交汇最终通过一

<sup>⑩</sup> 朱明哲. 东方巴黎: 略论二十世纪上半叶法国法学在中国的传播[J]. 北大法律评论, 2014(2): 581-606.

<sup>⑪</sup> 王伯琦. 法国社会学说在契约方面之最新趋势[J]. 实业部月刊, 1936(2): 1-15.

<sup>⑫</sup> 李启成. 治外法权与中国司法近代化之关系: 调查法权委员会个案研究[J]. 现代法学, 2006(4): 26-37.

<sup>⑬</sup> 李启成. 治外法权与中国司法近代化之关系: 调查法权委员会个案研究[J]. 现代法学, 2006(4): 26-37; 张仁善. 论中国司法近代化进程中的耻感情结[J]. 江苏社会科学, 2018(4): 132-141.

<sup>⑭</sup> 宝道. 暹罗治外法权之撤废[G]//王健. 西法东渐: 外国人与中国法的近代变革.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1: 274.

<sup>⑮</sup> Wigmore J. Les congrès de droit comparé premier germe d'organisation permanente internationale de la profession du droit; La proposition du doyen Wigmore[J]. Annales de l'université de Lyon, 1934, 45(1): 117-121.

群希望通过外国知识既改革祖国,又为自己在新社会中谋得一席之地年轻人实现。

他们绝非不平等国际社会中西方知识权力的被动客体,也非仅为谋一纸速成博士文凭的投机分子。他们对自己在法国可以学到的知识,学习的方法和过程,可能付出的代价都有所认识。为了学到他们认为可以实现国家富强的财政、行政、外交学等知识,他们不得不用尚未臻于完美的法语与管理方争执,争取教授们的支持。从他们抵达法国到最终取得学位,往往需要七八年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他们不得不时刻关注着祖国瞬息万变的局势发展。他们的目光流转于欧亚大陆两端,不断向自己,也向法国法学提出关于祖国之命运的问题,并在回答这些问题的过程中选择研究的主题、完成这些选题最佳的导师和途径。他们既在世界体系内思考中国,又希望通过一个强大的政府解决社会问题,从而同时实现国富民强。与此同时,里昂法学院对新兴社会科学的开放态度和对社会主义的支持,则为他们提供了一种表达自己政治关切的理论话语。

### **Cognitive Autonomy in the Westernization of Chinese Law: A Transnational Study of the Cultivation of PhD in Law in IFCL**

*ZHU Mingzhe*

(College of Comparative Law,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Beijing 100088, China)

**Abstract:** Amongst students of L'Institut Franco-Chinois de Lyon, 25 graduated with a Doctor degree in Law. The archives left by these Chinese students in Lyon make possible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process by which they complete their studies. To insist on their own choices of subjects, they were in consistent communication, discussion and even debate with professors and administrators. Their conscience and autonomy are clearly revealed. The substantial content of their conscience about legal science and about the future of China can be explained with regard to the particularity of Lyon Law Faculty, as well as to the mentality shared by other Chinese students abroad.

**Key words:** L'Institut Franco-Chinois de Lyon; legal education; Sino-French communication; autonomy

(责任编辑:杨珏)